

李方桂先生的來信

丁邦新

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·香港科技大學

在我的回憶裡，李先生的身影從來沒有淡過。

我的一生有許多位老師，有的豪爽過人；有的拘謹木訥；有的沉穩鍊達；有的高雅不群。如果要從反面來想他們的缺點，總會覺得他們多多少少在某一方面會有些問題。也許一個學生不應該想老師的缺點，但是到了六十之年，人生的閱歷豐富以後，從前許多不懂的事情，現在豁然開朗。老師當年的行為不由自主的在眼前一一想過，就會覺得老師也有他看不到的地方，各人有各人做得不盡完善的地方。只有李先生似乎沒有任何缺點，無論在做人和做學問兩方面都可以做為我一生學習的榜樣。今天我不在這篇文章裡談他做學問的問題，只談他做人的種種。中國古人說「經師人師」，李先生不僅是「經師」，而且是一位完美的「人師」。並不是老師去世了就說他的好話，我現在所說的實在就是我心裡的話。

在跟李先生來往的二十多年中（1966-1987）我收到他許多來信，到今天為止，這些保存下來的信，就成為我寶貴的記憶。現在我從這些信裡摘取許多片段，來證明他待朋友的熱忱，待晚輩的關心，以及他自己所說求學的經過，表示我的追思。我們做學問要有證據，我現在就是從他的信裡，證明我的說法。用他自己的信，證明他的為人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一手證據，無可疑惑的！

首先，我就來說他待朋友的熱誠。

「邦新兄：

昨天接到 Serruys 的信，說他把中央研究院出土的甲骨全譯完了。正在打字。希望與你的魏晉音同樣作專刊在研究院發[表]¹。我想這真是件好事，（1）使中研究院甲骨的發掘有更廣泛的讀者。（2）使甲骨學有文法上的新看法。（3）文字可與語言打成一片。我想你對你老師的作品也一定有信心。

至於本院只印本院人員的作品一事。我想可以給 Serruys 一個通信研究員（史語所的）。舊通信研究員都已死去，如 Karlgren, Pelliot, Miller 等，如 Serruys 肯接受。我想印他的書沒有太大的問題。請你斟酌進行為禱。

¹ 用方括號表示我加的字，有時是李先生的筆誤，最常見的是信末我所加的年代。

這本書將是一部重要參考書，與本院聲譽有關。希望你努力進行。

弟方桂

[一九八一年]六月五日」

這封信裡講的是 Serruys 的事情，我當時是語言組主任。我按照李先生的意思請 Fr. Serruys 做通信研究員，同時出版他的翻譯。這件事由高嶋謙一協助完成。也因為如此，後來我才能夠請 Fr. Serruys 到台灣去做兩年的研究。

「邦新兄： 你的衣服已訂製，一時作不好，讓他們航寄，兩禮拜後可到。茲橋本萬太郎過台返日擬在台小住。不悉中研院有客房否。舍下亦可住，請吩咐月霞收拾一間房間給他。給預備早晚餐等。似也可請他講一次，如果來得及。我們仍定廿四返台，匆此即頌
時祉

弟方桂頓首

[一九七六年]十二月廿二日」

橋本萬太郎是一個晚輩，李先生要留他在家裡住。那時李先生在台灣有一個宿舍。同時要僱人月霞照顧他，替他準備早餐晚餐。對於一個晚輩這樣的照顧實在是難得的。

「邦新：

我最近收到 Thomas A. Sebeok 的一封信，說日本請他七月下半到東京大學講學，並且請他到台灣一遊。他很希望中國的大學或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可以正式請他講學。（七月上半）他是 *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* 的主編，跟趙元任先生和我都是好朋友。他有信給吳院長，我希望你可擔任聯絡員與他通信。

他的信附上。另寄 1927 Univ. of Chicago Magazine 的一篇文章(Sapir 寫的)，可供你參考。

方桂

[一九八五年]一月廿四日」

這封信是講 Sebeok 的事，信的內容就很明白，不需要解釋。李先生不僅對活著的朋友如此，對死去的朋友也一樣照顧。

「邦新我兄：

最近我接到李光謨一封信。他說今年李濟之安葬的事。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安葬，何人經管。他想要來台灣參與他父親安葬的事。你看此事應當如何進行。濟之先生一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，院內有何舉動。光謨來台的事，如何向當局進言。你有何意見？

弟方桂啓

【一九八四年】二月十七日」

「邦新我兄：

來示敬悉。你已去打[聽]安葬事，我只好等你的回音。你替我籌了三策，甚為感激。你的第一策，最省事，但是以我與濟老的五十多年的同事交情，及光謨與林德培德從小在一塊的情形，似乎不能不設法，代他一問當局的意見。我想問問小梅有何消息，再還得問光謨可停多久，何時返大陸？

第一下葬事何如？第二何時下葬？光謨可住多久？我對此事也一無所知！我要等你的消息再進行下一步。給院長寫信是一個辦法，我當然出名寫，但我與吳公不熟。

.....

方桂

【一九八四年】三月七日」

「邦新我兄：

收到聲調擬測的文章，這是一種方法，能適用到何程度，將來再說。大著未能細看，將來再討論。

近兩個月給錢院長寫紀念論文。大約年紀太大了，思想很不易集中，寫的很慢。將近寫完。抄好後奉上請修正。這不是客氣話，時常感覺思路不週的地方。

我還要繼續寫幾篇。把我在中國演講的資料，整理出。中國語文登了我的演講“聲韻結合的問題”，其中有好幾個問題我要仔細的寫下來。給錢先生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“論開合口”。

“民族語文”也有我一篇演講。複制兩份：敬請指正。嫂夫人對繪畫十分感興趣，希望能去故宮多看古畫。

前些時我給許倬雲去了一封信，關[於]濟之下葬及光謨要到台北的事。承他

立即與華府吳某接頭，他說應當請蔣彥士接頭，可是也表示不甚樂觀。我現在打算給高小梅去一信，同時請轉達我給吳院長的信。兩信寫好後將呈上一觀。即問

近好

弟方桂

[一九八四年]四月十號」

「大猷院長我兄：自兄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以來，每聞佳音，不勝雀躍。近得李濟之先生之子李光謨來信，頗念爲其父骨灰下葬事，想於本年來台親自辦理。濟之兄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近六十年、主持考古研究、立下科學基礎，並創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，教育人材，一生盡力學術。爲後人模範。濟之曾任史語所所長，亦曾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。光謨爲其父下葬事中研院似可斟酌情形，請示當局可否允許來台。^桂與濟之兄有六十年同事之誼，其子亦與我兒女自幼熟習。故敢以此事拜干，如何辦法，敬請示知一切，不勝感激。專此敬請

道安

弟李方桂敬上

[一九八四年]三月廿一日」

這幾封信裏談的都是關於李濟先生安葬的事，他的公子李光謨在大陸，要到台灣參加他父親的葬禮，在那個時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。我的意見有三個，第一個意見就是不管李光謨的事，但是李先生回信說：「但是以我與濟老的五十多年的同事交情，及光謨與林德培德從小在一塊的情形，似乎不能不設法，代他一問當局的意見。」結果李先生除了給我寫信之外，給許倬雲、高去尋（小梅）兩位先生和吳大猷院長寫信，可見他對朋友的交誼，不因死生而有所改變。

對朋友如此，對學生又如何呢？

「邦新我兄：

我們現在正搬家，一切書籍，家俱都已運往加州。Gil Mattos（高雄中山大學）想要我的“中國上古音聲母問題（1970）”，及“幾個上古聲母問題（1976）”。可否請你把你的寄給他，我到加州後再寄還給你。

此外在 *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* 一書中的 *Archaic Chinese* 一文，也請你複製一份給 Mattos！多謝。他預備發表他的石鼓文的論文。

方桂

[一九八五年]四月五日」

Gil Mattos 是我們的同學，他向李先生要論文，李先生要我轉寄給他，可見他對學生的關心。

「邦新我兄：

我們現在 Seattle 等小島生產。大約就在這幾天了。自從離開台北，各處奔跑已將四個月了。頗覺疲倦。正月中返 Honolulu。不想再旅行了。歐州之行也許打消，旅費太貴了！

你太太身體近日已復原否？至念。希望好好保養！

你近日還在調查緬滇邊區的語言嗎？海南的資料整理的如何了？

近來很想把所有古代藏文的碑文資料（7-9 世紀）收集，成一小冊，以便研究的人方便。包括研究文章的資料（Bibliography）碑文（原文）及羅馬字。不加翻譯。或加一字的引得。不知可否實行。

明日是 X'mas Eve，就此恭祝
闔第安好

弟方桂敬啓

[一九八〇年]十二月廿三日」

這封信裡提到他想做的一件工作，把藏文的碑文資料收集成一書。這件工作就成爲後來他跟 South Coblin 合作的書 *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*。他自己想做的工作願意跟學生合作完成，除了表示 South Coblin 的能力受李先生肯定外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無私的表現。

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還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：

「邦新我兄：

李壬癸大約五月間考，通過後想回去作一年的山地語調查，我希[望]中央研究院能收容他。他沒家眷，可以給他一間單人宿舍。此人如回去，到是山地調查的極適當人物。他已經短期調查過幾個 **Micronesian Languages** 了。如果他專研究台灣的 **Austronesian Languages**，他長期回去的機會很大，希望你盡力爲他設法(薪給、調查費等)。

.....

方桂

[一九六九年]十二月十二日」

李壬癸已經在台灣工作三十年，對山地語 (**Austronesian Languages**) 作了許多貢獻，現在再看一九六九年李先生的信，李壬癸並沒有辜負李先生的期望。

這些可以說是李先生鼓勵、關懷、照顧後學的實例，但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更清楚。

「邦新我兄：

得來示蒙你讀過及改正論開合口文，甚是感激。短文一篇“論聲韻結合—古音研究之二”，附呈請指教。

我給傅懋勳去了一信也附呈，他想知道我爲什麼學美州紅人語言。有些意思爲前人所未了解。我一生受師友的栽培，因此也不敢虧待我的後學。問 好。

弟方桂

[一九八四年]五月五日」

「我一生受師友的栽培，因此也不敢虧待我的後學。」正是李先生對後學的態度。

這封信裏李先生提到爲什麼學習紅人語言，我想這對後學有一定的警惕作用，現在我們就來看這封信。

「懋勳我兄： 得來示敬悉一切。我學美紅人語言的經過可以回憶一下，供你參考。一九二四到美國 **Michigan** 大學，原是爲將來回國研究中國境內的語言。但是那時美國沒有研究亞洲語言的人，也很少有語言學系的大學 (**Chicago** 大學

是例外之一)。可是我倒可以自由學習。學習的方法有二、(1) 跟最有名的人學，而且學習他專門有心得的，(2) 研究印歐語言學的基本知識，原理，方法等。因為那時的語言學主要是印歐語言學。一九二六大學畢業，已經對日耳曼語言學，英文語言學有點研究，同時也涉獵到古代德文，英文，以及拉丁文的文學。畢業後開始到芝加哥等大學研究印歐語言學，那時的大師是 Carl Darling Buck。他主要供獻是拉丁希臘的方言，因此我就跟他學比較拉丁希臘文法，也跟他學點兒古代印歐語言，如古代波斯文 Old Persian, Avestan；古代保加利亞文 Old Bulgarian，立陶宛文 Lithuanian 等。梵文是跟 W.E. Clark 學的。他後來作了哈佛梵文系主任。又在德文系學了些古代南部德文及北部德文，高索文 (Gothic)，冰島文 Icelandic，古挪威文 Old Norse 等。又跟 L. Bloomfield 學古日耳曼語的音韻，造字，文法等。這種學問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。我的另外一個目標是想記錄及研究些沒有文字的語言。那時只有美州紅人語言可學 (在人類學系)。Edward Sapir 是當時最有名望的人，正在研究 Athabaskan 語言。我就跟他學習記錄的方法，分析語法等。一九二七年寫成一篇碩士論文 A Study of Sarcee Verb-Stems (Athabaskan 語言之一)，後來到加州北部調查，一九二八年寫完了一篇博士論文 Mattole, An Athabaskan Language。後來又在加拿大北部研究“赤坡巖” Chipewyan 語，寫成了幾篇文章，關於他的音韻，文法，詞彙，及故事等。現在仍是 Athabaskan 語言開蒙的讀品。因為很自由，學了些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對我個人的修養，頗有幫助。現在的學生都是有所為而來求學，學語言學的不下數千人，但是論文題目仍是漢語音韻，方言，文法等。很少人肯學一個自己不知道的語言，因此對於研究美州紅人的語言，不甚樂觀！

給你及徐琳公母倆問好！

弟方桂

[一九八四年]五月一日」

李先生在這封信裡提到他求學的過程，實在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，語重心長的批評，也值得我們警惕。

有一次我問他到史語所工作的經歷，他寫了一封長信回答我。

「邦新我兄：

壬癸信說八月 20 前後到 Honolulu，正好是我要離開的時候，希望可以看見一面。我們是先到 Seattle 去，如果你也可能在那時去 Seattle，我們就可以在那兒會面罷。法高信說帶女兒去 Oregon 開會，龔可能不去開會了。

你想知道我在史語所的工作經歷，我可以大概說一說：一九二九年我回國，

回國前 Sapir 有意留我在美國，那時我堅決要回國，Sapir 就向洛氏基金替我請了一個 Fellowship，去中國回美國都可出旅費，此外在中國旅行也可另外給錢，每月美金 300（合中國大洋 600），一年為期，並可續請。條件極優。所以 1929-30 我雖到所，但並沒有受薪水。因此同事說笑說方桂到所是有陪嫁的。1930 洛氏仍函問是否繼續 Fellowship，我就辭謝了。我在海南島調查了幾個海南方言，吸氣音也是那時發現的（1930）。

那時所長是傅斯年，第一組主任是陳寅恪，第二組主任趙元任，第三組主任是李濟（只有三組）。主要工作都是要找新材料。第一組除去經史學外，就是整理檔案，由徐中舒先生總其事，第二組就有調查方言計劃趙先生主其事，中國傳統音韻由羅莘田先生主其事，我就想調查非漢語的語言，並沒有計劃。先開始研究古音，然後因國內情況就選定台語的研究。先到了泰國住了 3 個月學習泰文，後來開始在廣西調查了十幾個壯傣方言。又調查一個雲南擺夷話。除去漢語古音，台語，也參加了方言調查。更作了點兒藏語研究。

1937 我赴美任耶魯大學客座教授。那時國人到美任著名大學教授的是很希有的事，Time 雜誌當時還寫了一段新聞！那時中日開戰，心中不安。兩年後返國（1939），到昆明，又開始研究剝隘語言，並指導夷語研究（馬學良等）。後來又同張琨到貴州調查仲家語言（現稱布依）。就在榕江，荔波等地發現了峒語，水語，莫家語，又在定番縣內（貴陽之南）發現羊黃語言。都稍作了些調查，收集了些資料。也得了些苗語資料（黑苗），苗語主要是張琨的工作。

此外的時間就是整理工作，並在燕京大學客座教授。一直到勝利復原。

1946 又赴美到哈佛。那時國勢日非，到 1949 便有家歸不得了！

方桂

[一九八四年]七月五日」

他說：「那時中日開戰，心中不安。」我們可以知道是因為全國都在抗戰，李先生置身事外而有所不安。兩年後他們就決定回國了，那時正是抗戰的第三年，國家最艱苦的時候。書生報國，共赴國難，就是在艱苦條件下，多做語言調查的工作。

當然，李先生在信中有許多談到學問的地方，現在舉一兩個例：

「邦新我兄：

五月廿七日信，敬悉一切。我還有二三篇類似的文[章]都打算到集刊發表，將來如有用可成單行本。其中有討論元音 i 的文章，還請指正。

我想我當時以為海南的 b, d 音是受外語的影響，第一因為黎語有，台語也

有。台語還有 p, t。第二越南語更與海南話相似，沒有 p，而 t 是從 s 來的。這只是很表面的看法。Rhmen 語也有類似的現象。最近一位日本人，從趙先生處(?)也以為上海浦東有 b, d，有些粵語方言也似乎有 b, d。這問題也許要擴大！

李壬癸八月間來美。在此地教中文半年。也想到 Ohio 教半年。因此有代二組主任的問題。你何時返台北？如八月前半月過此，希望你能稍停。我們八月後旬要到 Seattle，並赴 Oregon 的會。請示知為盼。

弟方桂

[一九八四年]6月8日]

「邦新我兄：

六月六日信已收到，你去 Ohio 前的信也收到了，謝謝。我在八月二十前後才離開夏威夷去 Seattle 那裡小住。再到 Oregon 開會。原以為你七月底八月初回國，所以希望你過夏威夷一停，跟你談談。

Oregon 開會後即赴培德處住兩三禮拜，十一月才回到舊金山小住月底才回 Hawaii。

我希望能在八月初見到李壬癸，但不知他在此停否。在此教書期間，可住我們的房子。

謝謝你對我的文章的意見。很多人都以為 j 與 i 對聲母應有同樣的影響，這也許受了北方近代音的影響。但不必一定如此。如果把四等韻擬成 e，那麼切韻時代，除了止攝就沒 i 元音了，這也不平常！

最近寫第三篇，很久沒能動筆。第四篇更要到回台北後再寫了。

希望你早一點告知行程。我好準備。

弟方桂

[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]

這兩封信裡李先生談到海南島吸入音 b、d 的來源，也談到四等韻該不該擬測為 e 的問題。一直到晚年，他八十多歲的時候，這一種追求學術真理的精神都沒有停過。

李先生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，有中國人的儒雅、熱誠、涵養和氣度，又是一個受到西方文化薰陶很深的人，所以他做學問的時候，非常謹嚴，有過人的洞識力，分析又精細。這些原因使他成為偉大的學者，成為我心目中永遠的恩師！